

马来西亚华教人物与他们的文学¹

Key Figures in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ir Literature

安焕然*

(ONN Huann Jan)

摘要

“文如其人”，指文学作品是揭示作者内心世界和信念的媒介。而接触文学，用文学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则从马来西亚华教典范人物的文学作品亦能探出他们的心迹和志向。从林连玉、黄润岳和沈慕羽等早期教总领袖的文字作品，无论是马华新文学还是马华旧体诗，都为分析华文教育倡导者在历史与社会政治挑战下复杂的情感与理智反应，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证据。这些文字 / 文学作品的表达不仅阐明了他们斗争中的毅力、痛苦和抵抗，而且表达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教育理念，以及感领教育的真谛。

关键词：华教、文学、林连玉、黄润岳、沈慕羽

Abstract

The adage “writing reflects the person” suggests that literature serves as a medium through which an author’s inner world and convictions are revealed. When literary works are employed as a le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he works of seminal figures in Malaysia’s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ir ideological orientations and personal aspirations. Whether within the domain of Malaysia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or Malaysian Chinese classic-style poetry, the writings of early Jiao Zong leaders such as Lim Lian Geok, Huang Yun Yo, and Sim Mow Yu present rich textual evidence for analyzing the complex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responses of Chinese education advocates amid historical and sociopolitical challenges. These literary expressions illuminate not only the perseverance, anguish, and resistance characterizing their struggle but also articulate a deeply hel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the pedagogical fulfillment they derived from their vocation.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Literature, Lim Lian Geok, Huang Yun Yo, Sim Mow Yu

¹ 本文原为2024年6月27日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主办“新纪元第一届‘中学老师的文学课堂’华文老师文学教学研讨和演绎观摩会”专题演讲稿整理修改而成。

* 安焕然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电邮地址：huannjan.onn@newera.edu.my

前言

华教的存在，有其当下的格局；华教的发展，亦有前贤奋斗与耕耘的轨迹。饮水思源，不忘初衷，还得时时回望华教前贤的人格感召。而从华教人士的文字留存：他们的言论集、日记，以及他们的文字 / 文学书写，都能探析他们的心迹和志向。

“华教族魂”林连玉先生曾说：“没有教总，便没有华教。”“华教今天存在，华文教育的受到支持，是和华校教总分不开的。”（教总秘书处 1991：34-35），而在教总领导人物之中，林连玉、黄润岳、沈慕羽，无疑是早期教总华教之典范人物。从林、黄和沈等三人的文字作品，无论是白话新文学、抑或带有格言意义的公开言论，还是他们的旧体诗词，都为分析华文教育倡导者在历史与社会政治挑战下复杂的情感与理智反应，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证据。

惟在论述华教人物与他们的文学之前，不妨先来谈谈文学的解读，何谓“文如其人”，文学与人格之间，又是一层怎样的互映关系。

一、“文如其人”还在于一种人格情操

我们从事中文教育工作的，在进行文学作品赏析和教讲时，亦当有这样的认知：1982年，中国《中学语文教师手册》（按：中国的语文课指的即是中文 / 华文课）就明确指出“语文教学法”除了“读写结合”之外，还在于“文道统一”。所谓的“文”，指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读听说写基本技能训练；而“道”则指思想教育。“文道统一”，亦即教学过程需兼顾语言训练和思想教育。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以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在说写训练中既强调语言文字方面的指导，也重视思想认识方面的启发，陶冶性情（姚麟四主编 1982：976-977）。

而这种“文道统一”，也就反映在“文如其人”的文学认知上。所谓的“文如其人”，指文学作品是揭示作者内心世界和信念的媒介。王蒙《文学把人与上苍相连》指说，文学以最直观、最注意细节、有时又带有一种隐喻性的，并且充满感情的，“提供给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思维的方式、行事的方式”。与此同时，文学也是一种审美的方式，“使人体验与上苍、宇宙相连相通的感觉”。当然，“文学还是一种想象和假设的方式”。“总体来说，文学的方式指的是一种精神的方式”，“是一种在精神上丰富自己、强化自己、提高自己和完成自己的方式。”“所以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多接触一点文学，使自己用文学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对应这个世界，处理自己的人生，总归是一件好事。”（王蒙 2011：5-22）此外，王蒙也指出“文学是富有个人性的方式”，“一个人只有知道世界上的难处，知道社会上的窘迫，知道人生的痛苦，他所抱的乐观的希望，才是靠得住的，有份量的”（王蒙 2011：19）。也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会有‘文如其人’的感觉。”（王蒙 2011：11）

中国当代作家王蒙，曾荣获茅盾文学奖，获颁“人民艺术家”荣誉勋章，亦曾担任中国文化部部长。他的“马中关系”，从1993年来马演讲开始，一直与马华文学 / 文化界有着很良好的交流和互动。2024年，王蒙九十大寿，过去一直接待他来马的戴小

华特撰文《文明互鉴与中华文化的世界理解：王蒙与马来西亚》详细记载了王蒙的“马中关系史”，并在文末如是说道：“王蒙来马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学上的激荡和启发，还有很多生活中的态度和哲理。最重要的是，让我引述世界华文媒体董事会主席张晓卿的这段话：‘王蒙虽然历经磨难，但是他内心的赤忱、良知、正义和道德勇气，对理想的坚持、知识份子的爱护与关怀，终于让他在历史的折腾中，熬出了读书人的典型和尊严。我们不应只看王蒙神采飞扬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他创作的精神、丰富的人生经验，他对时代的承诺，进而扩大、延伸到我们对整个历史和文化的反思。’”（戴小华，2024年6月22日）

综上，简言之，我们说“文如其人”，其实还在于一种人格情操的体现。从司马迁之《史记》写屈原，言读屈原作品，悲其志，想见其为人。司马迁说屈原的文章虽然简约，其旨趣却极大而义远。屈原志向高洁，所以他的文章所称述之事物也散发着芬芳。从屈原文章透露出污泥而不染之自觉，推此志也，可与日月争光，这是中国文学评论相当“在乎”的文学传统。一个人品极差、毫无原则的文人，也就没那个必要谈什么“文如其人”了。

同理，马来西亚华教典范人物的文学/文字作品，亦可由此“文如其人”中，探析他们的心志、他们的坚持和他们的理想。

二、“马华的鲁迅”与“华教斗士”林连玉的诗文

鲁迅没有来过东南亚，但他对东南亚的影响很大，而且其影响不仅限于文学创作方面，还扩及政治、社会、人格塑造和道德修身层面。在此不得不提王润华的“东南亚鲁迅学”研究。王润华以其跨国越界阅读和后殖民主义论述，指说鲁迅对海外华文或华人世界的影响，最为典型的特色之一，就是“反抗精神”。早期的新马华人反殖反帝经历促成了鲁迅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象征的形成，他跨越文学，进入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结构层面，成为反抗殖民主义的道德精神力量，当然也成为华人建构经典文学、与民族新文化的典范（王润华、潘国驹，2017）。

而这样的“反抗精神”也经常（如方修等笔下及其资料筛选下）以“现实/写实主义为主流”的“马华文学”中出现。就像张锦忠所指出的，1930年以后，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文学场域的影响范式主要是转向以鲁迅、普罗文学与社会写实主义。关键显然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斗争路线的确立，而“在南洋铁屋以鲁迅为旗帜”，鲁迅的角色在这些具有反抗意识的马华写作人的想像中显然是“战斗士”的形象多于“书写者”。以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姿态为榜样，如同鲁迅名言，“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当个“真的猛士”（张锦忠 2022：206-208）。

同样地，在华教运动史，我们也有很多“华教斗士”，最典型的的就是“华教族魂”林连玉。但这无关乎白话文学抑或旧体诗。林连玉的诗作，很多都是旧体诗，却同样具有明显的“反抗精神”。最出名的就是那首《吕毓昌妹夫有诗见寄步韵一首》（林连玉 1986a：31）：

飘零作客滞南洲，时序浑忘春也秋。
幸有嶙峋傲骨在，更无暮夜苞苴羞。
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
海外孤雏孤苦甚，欲凭只掌挽狂流。

林连玉的这首“反抗诗”，诗里展露出来不屈不挠的华教斗士形象，被高嘉谦喻为“如同鲁迅式的抵抗与战斗”，即使是首旧体诗，亦能勾勒出华校、华文在马来西亚面对严峻的存续困局，回应现实语境的本土书写，以及投映抵抗精神的华校情结底蕴（高嘉谦 2022：209-212）。

但相较于鲁迅的“横眉冷对”，林连玉的“横挥铁腕”要去徒手击打（批）龙甲，其怒奋的“空”拳，还多了一层“悲壮”。林连玉似乎特别偏爱忠臣鬼雄，其诗云“嵯峨道范久追扳，正气长留天地间。赤胆撑扶危社稷，丹心规复旧河山”那是林连玉的诗存《咏史一文天祥》（林连玉 1986a：48）。又作诗“一封誓草斥强梁，凛凛春秋大义彰。视死如归文信国，临危不屈张睢阳”。扬州十日，留下什么呢？林连玉诗云“万树梅花开岭上，声名更比梅花香”。那是林连玉之《咏史—史可法》（林连玉 1986a：50）。

热爱华文教育，维护母语教育，马来西亚华教不仅是一项教育课题，同时也常被视为争取民族权益，诉求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群众运动。这是马来西亚华教相当重要的特点，而在华教运动中，林连玉精神典范的形塑，亦让华教斗争的正当性与神圣性上存在一种道德典范。1985年12月18日，林连玉逝世。21日下午，林连玉的灵柩在万人陪送下，由雪隆中华大会堂出发，环绕吉隆坡市区游行五公里后，在福建义山入土。其后，马来西亚全国各地相续举行林连玉追思会和哀悼会，随后设立林连玉墓园和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林连玉遗著，并以林连玉的忌日定为“华教节”，颁发林连玉精神奖。自此，华社为林连玉塑造了一个“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带着“悲壮”色彩的“族魂”形象，林连玉成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马来西亚华社为华教“招魂”的神话。²如前所述，林连玉的旧体咏史诗尤崇忠贞的鬼雄，而马来西亚华教运动斗争史上似乎也很爱塑造鬼雄。

当然，这族魂鬼雄是真正有正气傲骨的。是非、爱恨分明的林连玉，有他的坚持与原则。他在《赠郭寿镇先生两首》中写说“与君同是倔强人，节操坚持砺此身。世乱宁甘侣蠹畜，时安也复乐清贫。”（林连玉 1986a：17）林连玉《学诗自白四首》表明

² 林连玉，何许人也？一介书生，一名华文老师，带有傲骨的华文教育工作者。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陈嘉庚倡建的福建集美学校师范部文史地系。1927年下南洋，在马来亚和印尼爪哇等地任教。1935年任教于吉隆坡尊孔学校。战后至马来亚独立，林连玉致力于维护华文教育的基本权益，推动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曾任教总主席。然而其坚持“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信念，致力争取把华文列为马来西亚官方语文的努力受到挫败，甚至还因此而在1961年被教育部取消教师注册，又被内政部以“故意歪曲与颠倒政府的教育政策”，动机“含有极端种族性质”，“促使各民族间的恶感与仇视，可能造成动乱”等理由，被褫夺了公民权。关于林连玉的研究，可参见郑良树：《林连玉评传》，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05；陈绿漪等：《林连玉研究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学院、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2015。

他是一个“风花雪月我无缘，不画鸳鸯不写仙”，“无病呻吟素所嗤”之人（林连玉 1986a: 12-13），即使来到波德申海边看海，其诗依然严肃认真地写说此情此景“坚贞自负千秋骨，化石犹能障怒潮”（林连玉 1986a: 42），“华教斗士”，“马华的鲁迅”，时时都充满着战斗的意识。

鲁迅杂文，批判性强，而马华文学界过去也有很多以鲁迅为旗帜的“鲁迅风”的杂文体式表述（张锦忠 2022: 208）。林连玉的白话杂文，同样也有点“鲁迅风”。然而，他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中，针对鲁迅曾就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三种人物写过的一篇杂文进行回应，林连玉认为“在我看来，（鲁迅之文）只有三分之一的真实”。因为：“那聪明人，只有空虚的同情，没有实际的行动，分明是伪善者，鲁迅先生说他是聪明人，这是假的。那傻子，有侠义的胸怀，有实际的行动，分明是革命家，鲁迅先生说他是傻子，这也是假的。独有奴才，确实是奴才。”（林连玉 1986b: 42）可窥林连玉对人对事的看法，比“中国的鲁迅”还要“严肃”看待。林连玉是立场鲜明，不跟你嬉笑调侃，不跟你风花雪月，更不会无病呻吟。

只是林连玉看事物，却也不是非白即黑，非左即右的简单二分法，甚至他还曾推崇过“坦荡荡”的“中间路线”。林连玉〈路〉（《吴钩集》）³这样说：

“提起了路，曾听见人家说：不是走在这边，便是走在那边，绝对没有中间的路线……（按：但）仔细研究起来，路的所以要分边来走，都是那些争名争利的车马豪客，在作其怪。他们驾着车，骑着马，在路上横冲直撞，往往把人命当儿戏，自以为路线正确，把人头也当为马路，因此为着策划安全起见，才不得不把一条广阔的路，分成两边来走，挤去了中间的路线。假如我们有杀马毁车的能力，使那些车马豪客，少干一些罪恶，不得展其威风，则不消说中间的路线，又是最坦荡荡的了。”

（林连玉 1986b: 2）

林连玉对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看法，也是很开明、开放的，绝非华夏至上的大汉沙文主义者。更不会因是“非我族类”就嗤之以鼻，或大小事皆好批评。例如在《谈马来亚的精神》一文，他说：

“依照我个人的意见，马来亚精神，最美满的境界，应包括下列四种要素：第一，是英人的民主精神。第二，是华人的勤俭的美德。第三，是巫人的乐天襟怀。第四，是印人的和霭态度……我们理想中的马来亚精神，正是采撷各民族的精华而熔铸出来的好宝贝，所以事实上，也只有只许论长，不许论短了。”

（林连玉 1986c: 38）

³ 1956年尊孔中学高二A学生曾为他们的老师林连玉出版手抄油印本《吴钩集》。1986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配合林连玉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重新出版这本《吴钩集》。

“我们读过社会进化史，深深的理解，一个文明，如果长时期的闭关自守，便不免故步自封，没有日进千里的现象。反过来，如果两个文明，互相接触，则相倚相溢的结果就会熔铸起来，而成为第三文明，而这第三的文明，必然是较诸原有两个旧文明，更加进步的。现在在这马来亚地方，不但是两个文明互相接触而已，简直有四五个以上的文明，在这里互相交流，可爱的马来亚啊！正是鼓铸新文明的洪炉，但愿大家好好的利用，不要自暴自弃罢。”

（林连玉 1986c: 39）

林连玉的言论和文告总是一再强调大马华人必须效忠马来亚。当然他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华人就必须放弃自己的语文和文化（教总33年编辑室 1987: 391-392），但若从上引林连玉的文学作品来看，我们会超脱在林连玉过世之后被华社形塑成的鬼雄刻板悲壮形象。林连玉有“马华鲁迅风”，其诗文有反抗意识，有反抗精神，“文如其人”的林连玉是个具有战斗意志的“华教斗士”，但他并不“冷对”他的敌人和群众。其诗文纵有崇鬼雄的咏史，却也有是非分明底下的大度和包容。这些都不是用“马华的鲁迅”刻板形象所能概括的。

三、“赢得两袖尽清风”的黄润岳

1960年代初，林连玉遭受厄难，接替教总主席之职的是黄润岳校长。一般认为，黄润岳和“战斗型”林连玉等“华教斗士”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典范人物。然而，黄润岳在接替林连玉担任教总主席期间，正值华教“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之际，黄校长“不畏强权，临危不惧，依然从容自若领导教总（王超群语）”；也诚如李亚邀所说，黄校长“为社群保住尊严与希望”。⁴

黄润岳校长，毕业于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初在中国外交部工作，1948年调派来马来亚总领事馆任职，两年后离开外交政治，投身教育工作，先在森美兰芙蓉中华中学担任高师班主任半年，续后在霹雳和丰兴中中学担任校长半年，1951年南赴柔佛新文龙中华中学掌校，1965年转赴马六甲担任培风中学校长。1974年退休，移居加拿大与儿女团聚，晚年醉心于基督教的宣教工作。

华校办学靠的不是狭隘、僵化的意识形态，更不应为意气之争而内耗。在面对外来挑战，争取华教公平地位的同时，华校能不能发展，还端视这所学校有没有正确办学理念和办学能力之掌门人。一所学校之校誉，其办学成功与否，很大因素在于办学者的的心态与素质。1950年代的新文龙中华中学，校风好，成绩佳，是南马公认办学出色的名校。这其中的功臣，除了继承陈嘉庚“倾家兴学”遗风的“校父”郑振中之外，当时该校聘得黄润岳掌校，董教之间彼此互信互重，精诚合作，亦是草创时期新文龙中华中学校务蒸蒸日上的重要关键。黄校长掌校新文龙期间，礼待同事，知人善

⁴ 教总主席王超群《向黄润岳主席学习》及李亚邀《为社群保住尊严与希望的黄润岳》二文均收录于邓雅荣主编：《恩雨润岳：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吉隆坡：文桥传播中心有限公司，2007，页314-315、316-317。

任,聘请不少优秀教师。他既讲究智育,也强调德育,义务兼任训育主任,制订《学生惩奖规则》,规劝学生要“为学”,也要“学做人”,言教亦身教。此外,黄润岳掌校新文龙中华中学期间亦开办了高级师训班,前后四届造就不少优秀的师资。1953年全校第一届初中毕业同学35人参加政府主办的初中会考,全体及格。次年,第二届毕业同学更是再造辉煌,34名同学参加会考,不仅百分之百及格,更有19名同学获得优等,是当年全马45所华文中学成绩最优者,一时间新文龙中华成了“名校”。黄润岳在新文龙中华掌校14年。继后,转赴马六甲培风中学担任校长,其任期也有10年之久,直至退休。诚如培风校友会主席史进福所说,黄校长的到任,为培风带动学习新风气,带动了整个有活力的校园文化(邓雅荣 2007: 335-338)。时任培风董事会总务的张雅山也指出,黄校长的到来,即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在学生的课外活动方面,贡献巨大。推动步操,组织旗队,成立培风军乐队,推展篮球运动等等(邓雅荣 2007: 329-332)。赖兴祥校长说,黄校长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君子,具有高尚人格和学术品味的儒者风范;爱薇亦说黄校长是一名“儒雅的长者”。(邓雅荣 2007: 341, 370-374)。但他在退休,离开培风之时,亦是“伤别”,“老泪纵横”,是他一生中最难过的时刻,也是最难忘的时刻(邓雅荣 2007: 337)。

黄润岳校长是多面手,曾专业执事外交政治,之后转而投身教育志业,同时他又兼文艺创作,白话杂文或古诗词都有其功力。在文学里,黄润岳的心境又好像是“逍遥”的,活得自在。何启良曾指说,如果“怒奋空拳搏虎头”概括林连玉奋斗的一生,那么,“伴我逍遥有白云”则是黄润岳退隐后的侧写(陆庭谕主编1997: 55⁵)。就像黄润岳在《乱弹集:庄子与红楼梦》一文所说的,《庄子》和《红楼梦》是中文写的两大奇书,他个人尤其喜爱和推崇。黄校长认为“《庄子》是中国哲学的百科全书,《红楼梦》是中国小说的大荟萃”。在阅读上,他不喜欢那些说教的范文,却认知“古人为文,都要文以载道”。他说《红楼梦》虽没说教,却不是专为叙述贾府一家兴衰而已。在第一回中有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颇与《庄子》思想有些吻合”。至于《庄子》,黄润岳认为其文如流水行云,逍遥自得,读来轻快,简直“深获我心”。晚年的黄润岳积极乐观,潜心于基督的宣教工作,并认为“《红楼梦》提出了问题,《庄子》说明了问题,《圣经》解决了问题。”(邓雅荣 2007: 257-259)

翻阅邓雅荣主编的《恩雨润岳: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我们不难感受到黄润岳校长那平易近人,时常鼓励学生的形象。他常与学生分享知识和经历。有一年,黄校长从美国考察回来,特地在晚上给新文龙中华中学的宿舍生讲述旅美经过,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和教育概况。这对当时纯朴乡镇的学子而言,是开拓视野的人文风气的构塑。马六甲培风董事张雅山也回忆说,黄校长在培风,提倡的是比较开放式的学习风气,师生之间的互动相当密切。课余之暇,师生经常打成一片,致使学校不再是刻板严肃的教育场所,反而逐渐形成一个温馨和谐的学习乐园(邓雅荣 2007: 329-332)。

⁵ 何启良此言出自于《沈慕羽事迹系年》之序《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陆庭谕主编:《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教总,1997,页19-55。该篇序言,何启良对比了林连玉和黄润岳的形象,并言沈慕羽则必须用“华教尚未平等,同志仍须努力”来诠释沈慕羽的基本生命形态。

如今，纵是进入网络信息和AI时代，教师的角色不论怎样转型，教学方式如何改变，华文教育的主客观环境纵然仍是恶劣，但一些最本质的师道，还是不变的。黄润岳校长《水调歌头》中写说：“十年磨剑赢得两袖尽清风”，“往事如烟如梦，南国多风多雨，温暖在簧宫。教学自相长，桃李应时红”（邓雅荣 2007：302）。“簧宫”即“学校”。能让华教工作者感受温暖的，依然还是“学校”。虽说“伴我逍遥有白云”是黄润岳退隐后的侧写，“十年磨剑赢得两袖尽清风”则是黄校长在华教界服务的风骨。南国华教纵然多灾多难，生存环境亦常得遭受凄风苦雨之考验，然而“教学自相长，桃李应时红”的温暖，相信仍是每位华文教育工作者还愿意留守岗位的最大“正能量”。

黄润岳的文学作品，还有游记随笔。有人说他的行文常是“自在和悠闲的”，甚至“出世意味浓厚”，“黄润岳代表的，是另一类型的马华知识分子”（何启良编著 2011：43）。但想回应上述论断的是，黄润岳的文章纵有恬适自在之笔触，却非不问世事的逍遥人间。黄润岳是有原则之人，他是积极宣教的虔诚基督徒，也是一名堂堂正正的君子儒。其文章自在间有寓意，常是言之有物。读其文，仍能感领他是明确持有终极关怀“文以载道”之人。他在《人生之道》曾云：

“道是什么？道就是生命的源头。也可以说：道就是生命。如果生命没有永恒，那么，我们的文艺创作，不过是春天的鸟语，夏日的虫鸣。如果我们没有终极的关心，那么，我们的心声，如昙花，如闪电。文学就会像一群儿童在吹肥皂泡泡，既美丽，又轻飘，只是再升高一点就破了。终极与永恒，固然是文学探索的方向，也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只有宗教才能给予解答。”

（黄润岳 1988：4）

四、正楷墨传“华教傻瓜”沈慕羽

另一名“文如其人”，亦是“字如其人”的华教典范人物，就是自喻“华教苦行僧”的沈慕羽（陆庭谕主编 1998：76）。沈慕羽在马六甲平民学校掌校长达27年，也曾担任教总主席长达29年。沈慕羽奋斗一生的荣辱，既有元首的封赐，也有老来带着药丸深夜被扣留的历练。但，不论其在位华教职务与否，为公平与正义之事，他总是身体力行，始终如一，坚持到底。⁶

⁶ 沈慕羽(1913-2009)，战前他领导抗（日）战，为民先锋。日侵马来亚，沦陷时他被系于狱。战后他曾一度活跃政坛，是马华公会青年团创始人。1956年，沈慕羽受英女皇封赐太平局绅，为华文教育界膺此荣衔第一人。然而在1966年，沈慕羽因争取母语为官方语文之举，遭马华公会开除党籍；1977年又为鼓吹华人大团结，涉嫌触犯煽动法令，诉讼两年始获平反。1987年，再因反对政府调派不谙华文教师担任华小高职事件而被逮捕，时已74、75高龄之身躯，顿失两年自由身。廖文辉〈千磨万击还坚劲——谈沈慕羽的事业〉（收载于《沈慕羽事迹系年》，页56-88）言说沈慕羽的事业，可归纳为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并可盖括为三：一、为国家民族权益奋斗；二、服务杏坛，作育英才；三、传扬华族固有文化。关于沈慕羽生平，学界和文教界已多有撰述，在此不赘述。关于其奋斗一生的事迹，可参见何启良编著，《历史慕羽：沈慕羽研究论文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11；陆庭谕主编：《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1997。

诚可谓“名如其人”，当年父亲沈鸿伯为这新诞生的儿子取名“慕羽”（亦即景慕关羽），就是寄以厚望这新生儿日后能以学习义薄云天的关羽精神，终生做个有正义又能为正义奋斗的人（教总秘书处 1991：27）。而成人之沈慕羽，终其一生，战斗一生，亦是“名如其人”，是忠厚、刚正和耿直之人。这种人格的确立，一来或是其“仰慕关羽”的天性，另一方面也因其长期的锤炼，对沈慕羽人格的影响。又所谓“文如其人”，亦是“字如其人”，欲探沈慕羽的心迹及其志向，可以从（一）其公开场合的言论格言，（二）其日记，以及（三）其书法等这三方面来探析。

（一）先谈沈慕羽的言论。在公开场合，沈慕羽的华教言论总是高亢、激昂，意志坚定，从不作违心的妥协。1966年，因极力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以敦陈修信为首的马华公会要开除其党籍，他在平民学校接受报界的询问时，意志坚定地指出：“被开除不要紧，但我争取华文成为官方语文的立场不会改变（教总秘书处 1991：129）。直到他68岁那年，在接受《建国日报》记者唐润娇访问时，他仍信念坚定地说：“人生就是战斗、服务，一个人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寿命，应该好好地把握，做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应该做一个有灵魂，有生命的人，做出对人生有意义的事，这才不会虚渡一生”（教总秘书处 1991：132-133）。

协商与施压，在华教运动中常是一体之两面。沈慕羽在接受张碧芳专访时亦表示：“协商是我们所主张的，一向来都如此”，然而1987年因政府委派不谙华语人员担任华小高职，引发全国华社抗议运动，事发后，政府“茅草行动”大逮捕，74岁的沈慕羽亦被捕入狱。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心情就是，要牺牲就牺牲啦！我们是准备死的，假如真有绳子，我们也是准备吊死的。”“为正义，看政府会不会感动，要以死来表现”（张碧芳 1992：59-60）。

诚可谓“服务一世，战斗一生”，这是沈慕羽终生不渝的华教信念。早在1977年8月22日，沈慕羽在《教师的气质》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祖先是华胄，读的是圣贤书，吃的是华教饭，做的是华教工，教的是华教书。直接或间接，我们是跟华教分不开来的。华教与我们息息相关；华教存，我们生；华教亡，我们不能偷生。华教问题，身为华人不挺身争取，难道摇尾乞怜，跪求他族施舍不成”（陆庭谕主编 1998b：91-92）。同样地，十年后（1987），沈老在主持“华小问题研讨会”开幕词中亦慷慨激昂地呼吁：“华人的命运操纵在华人手中；华校的命运，同样地操纵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要站稳立场，有气节，有原则，不投降，不馁志”（李亚遨主编 2006：130）。也就此坚定信念，沈慕羽终其一生，贯彻一生，言教亦身教。

但关于华教“存在”与“办好”的理解，沈慕羽似乎更在乎华教的“人格教育”。1970年4月7日，他在教总第十九届会员大会发言，说“华校更可爱”之处在于“华校是华人出钱出力创办的……华校除传授知识和谋生技能外，最注重人格教育，更以华人的传统道德为训练目标”（陆庭谕 1998a：27）。与沈慕羽关系密切的马六甲华教人士（培风中学“老总务”，林连玉精神奖得主）张雅山在1970年代买了新房子，请沈慕羽挥写招牌“怀安”，沈慕羽还加写给他一幅对联：“金石其心芝兰其室，仁义为友道德为师”，张雅山视为座右铭，作为一生处世的原则（李亚遨主编 2006：57）。关于此事，1994年8月23日，在马六甲四华团举办沈慕羽局绅荣休表扬会上，沈慕羽以《服务一世，战斗一生》为题发表感言，亦有提及此事，并言“仁义为友，道德为师”是

恪守儒家的君子之处世准则。在感言中，他还说“这生最光荣是身为华人”，“最爱是华教”。但光荣身为华人、最爱华教，也要承传优良中华文化，以身作则，沈慕羽严肃指说：“至于处世之道，应以儒家思想为家，才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之，为人要有原则，立场要坚定，是非要分，黑白要明，对民族国家有利者，不计利钝，奋力为之，损人利己者，决不可为。厚黑的思想，万万要不得，它将埋葬人类的良心，使世界大乱”（陆庭谕 1998a: 122）。如今上网，不难搜索沈慕羽的字和沈慕羽的照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张以马六甲平民小学为背景，沈老骑着脚踏车的照片。这不仅仅是其为华教服务一世的写照，更是一种儒者朴质实践精神的风采。诚如何启良〈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所言，沈老的精神典范，是一生以“道德人格的典范来防止马华政治人格 / 文化人格的失范”（陆庭谕主编 1997: 50）。

（二）谈沈慕羽的日记。在这方面，何启良已做了深入的探析。⁷简言之，自1950年代末以来，沈慕羽有写日记的习惯。相较于前述沈慕羽公开言论的慷慨激昂，《沈慕羽日记全集》的主编何启良则发觉沈老早期的日记“没有诅咒、谩骂、激愤之言”。但作为“儒家文化的实践者”，其日记仍处处充溢着积极入世，刚健有为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道情怀（何启良 2011: 44、46）。

惟在日记里，我们更能探析沈慕羽细腻的生活及其心境。沈慕羽的日记虽有少许的埋怨，也有许多感叹，例如《沈慕羽日记全集（第一卷）》记录他在1957年去美国的“壮游”，在日记里沈慕羽坦言这次的旅行“像浮萍及飞鸟似的，行踪飘忽”。但应当留意的是，沈慕羽并不像当年的南渡师友（如王宓文），总是在游记和诗文中流露那种乡关何处有，迁离飘零之旅的心境（何启良 2023: 23），沈慕羽的日记反倒更多是客观的记述，平和、谦逊地观察。例如他在大城市参观百货公司的规模，认为美国人勇于进取，事业不苟且，凡事精益求精，自强不息，但“好奇使他们（美国人）多发现；进取使他们样样都要争世界冠军宝座”。“我看了美国的小城市，感觉也如此”（何启良编 2013: 70）。沈慕羽日记也写说“内地的美国人情浓厚，居民刻苦耐劳”，住家区的“瓦屋板屋参半，可见得并不是个个富有”。但“住宅的四周总有旷地种花卉树林，家中布置雅致，蚊蝇绝迹，喝的是自来水、饪烹都用气炉，一切现代化，收音机、传真机、钢琴几乎家家有。住在这种美丽的环境里，叙天伦之乐事，多有趣啊！”“我们在这儿，越觉美国人的友谊可贵”（何启良编 2013: 71）。然而，纵然如此，美国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沈慕羽在日记里却仍如是记述“人虽在此，心实在马来亚。美国虽好，终不如马来亚。福建人所谓‘猪穴不值狗穴好’，意谓自己家虽穷，终比人家的家好。我在美国每临睡前，总要从皮篋中检出全家福及青年团等像片看看，像是必温的功课。默祷一家大小平安，学校及青年团办理顺遂，各友好大家康泰，事业进展”（何启良编 2013: 30-31）。可窥沈慕羽的乡关，始终就是马来西亚（当时的马来亚）。旅者行纵虽飘忽，心系仍是自己的家乡（马来西亚），其心并

⁷ 相关著作可参见何启良编：《沈慕羽日记全集（第一卷）》，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2013；何启良：《沈慕羽的“壮游”：1957年稿本〈沈慕羽日记〉》，何启良编著：《历史慕羽：沈慕羽研究论文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11，页1-54；何启良：《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2019；何启良：《沈慕羽日记研究：交游篇结客行》，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2023。

不飘零迷茫。沈慕羽积极进取，其君子儒的践行，其心迹、其心怀，都是很明确的，而且意志坚定。

（三）最后，来谈谈“字如其人”：沈慕羽的书法。沈慕羽挥毫写字，一生人就只写一种字体：正楷。看沈慕羽端端正正的字，就自然能感受其性格正直，犹如“关公坐镇”，充满正气。沈慕羽在《我如何与翰墨结缘》指说：“我此生嫉恶如仇，崇正尚义。我欣赏颜真卿所说的‘心正则笔正’。颜真卿的字刚朴道劲，流露出其为人之志气，我一路走来都写正楷，表现了个人性格”（廖文辉执行编辑 1995：29）。

有人说沈慕羽的书法出自颜（真卿）体。一来乃颜真卿是唐代安史之乱，敢于反抗安禄山的忠烈之士，为沈慕羽所崇。但熟悉书艺者，并不会认同沈老之书法全承自颜体。⁸事实上，沈慕羽虽自幼临摹颜体，但入读中学（培风），书法写得好的老师也不少。其中一个，就是沈慕羽认为“给我印象最深，毕生难忘的”是他初中时代的级任王宓文老师（陆庭谕主编 1998b：112）。沈慕羽在《悼王宓文老师》写说王宓文不仅有学识，也是“道德高尚，亲仁好义，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从不厉色，诚挚之情，顽廉儒立；循循善诱，令人有春风化雨之感”（陆庭谕主编 1998b：112）。而在华教运动上，王宓文也是重要执委。诚如何启良所言，王沈二人，既有师生情谊，在华教运动里也是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王宓文的书法也是沈慕羽所推崇的，说其书法“笔走龙蛇，神韵超逸”，然则王宓文的书法其实是以行草见长，亦擅篆书（何启良 2023：21）。沈慕羽纵是欣赏，却没承续。同样地，王宓文诗文多有书生漂流失落之感，这些悲秋之文字和愁绪，也并没有在沈慕羽的言论文章、日记和墨楷中显露。

据潘正联《沈体深入民间—精华结晶自成一格》所述，真正影响沈慕羽学习书法的却是初中二时的校长赵颂周。赵校长是前清举人，龙门师范毕业，学“赵孟頫体”，对沈慕羽往后的书艺影响深远。过后，沈慕羽又将颜（颜真卿）和柳（柳公权）两体优点溶入赵体，而自创一格，⁹可称之为“沈体”，又或谓“马六甲体”。因其后，马六甲一些书法人士如林源瑞、谢如镜和张光炎等也是以临摹沈体而闻名（李亚遨 2006：131-134）。

欣赏沈慕羽的字（书法），不能单看其章法结构的形态，或言其字“美不美”与否。这是“外行人”的提问。大马书法界之所以有“北孔南沈”之赞誉，持平而论，不仅仅在于北马孔翔泰的魏碑书法超越他人，抑或是南马沈慕羽写的楷书比别人来得“漂亮”。除了书法艺术，我们还要看到孔、沈二人高风亮节的人格风范。而在中华书法艺术里，书品和人品是需要结合来看待的。一个人的书法写得再“好”，但人品太差，他的字也就不太值得收藏。“北孔”孔翔泰服务华教近四十年，1950年代受聘檳城鍾灵中学华文讲席，却在1956年因反对华校改制，被校方辞退，甚至被有关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准在任何学校服务。幸得时任教总主席林连玉多方争取，禁令才得以取消。而书法“端庄稳健、浑厚雄伟”的“南沈”（鍾正川评语，见陆庭谕主编

⁸ 鍾正川就不苟同此说。他认为沈老书法虽脱胎于颜体，外形上有相似之处，但内涵上却有很大的差别。见鍾正川：〈南沈北孔—话沈老〉，李亚遨编：《晚节飘香续编》，加影，教总，2006，页126-127。

⁹ 事实上，沈慕羽也曾坦言：“我的字，以颜为骨，以赵柳为表”。见沈慕羽：《书法与服务》，陆庭谕主编，《沈慕羽翰墨集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2002，页18。

2006: 21), 亦“字如其人”, 一生光明磊落, 堂堂正正, 正直笃行君子儒之道, 富贵不淫, 贫贱不移, 威武不屈。

诚如郑浩千《漫将余力作书家——记沈慕羽先生》所言, 历代书法家如画家一样, 有多体兼擅, 亦有专事专精一体的。而沈老书法筑基颜柳, 就只写正楷, “却是个性使然”。因“他为人重义气, 个性敦厚朴实, 端庄而严整, 一如其书”。端端正正写出的“沈体”, 也说明沈老的个性倾向与择善固执的为人处事态度(陆庭谕 2006: 19-20)。

2001年全甲(马六甲)中学生书法展, 沈慕羽提醒年轻人学书法, 要从端正的楷书学起, 打好书法基础。他说: “就像学做人, 先要做个正直的人, 心正则笔正, 才不会走到歪路上去”(何启良编著 2011: 65)。世人崇敬沈慕羽这华教典范, 还在其推动文化志业的社会奉献及后续传承, 惟就像廖文辉《沈慕羽最后的十五年: 活动、贡献与局限(1994-2009)》所说的, 沈氏晚年的贡献与其说是教育, 毋宁是文化的(何启良编著 2011: 54-80)。

结语

接触文学, 用文学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 从马来西亚华教典范人物, 三位教总主席: 林连玉、黄润岳和沈慕羽的文学及其文字作品的表达, 不仅阐明了他们在华教斗争中的毅力、痛苦和抵抗, 而且也表达了他们言教身教, 根深蒂固的教育理念, 以及感领教育的真谛。

然而, 透过不同文类的作品探析, 我们亦能摆脱对华教典范前贤的刻板印象。例如古体诗词里的林连玉, 就跟其杂文随笔很不一样。前者, 诗言志, 崇鬼雄, 悲壮地留取丹心照汗青, 带有浓烈“华教斗士”(甚至是烈士)的反抗精神。惟若仔细阅读林连玉的杂文随笔, 则会惊讶地发现, 林连玉的杂文未必有“鲁迅风”般的匕首峰尖, 反倒写来宽宏大度。明理是非, 不是简单的二分。相较于此, 同样地, 黄润岳的诗词及其文章虽多是温文悠适的笔调, 有着周庄梦蝶的自在。但他的基督宗教情操, 他的中华文化涵养, 亦让他持有终极关怀, 有他的坚持和原则。黄润岳文字里的逍遥并非全然出世或不问世事。至于沈慕羽, 其公开的言论是激昂的, 其日记却是平实的, 其书法则显其人格表率 and 个性。但不论何者, 华教典范人物的文学/文字作品纵有其各自不同的文类书写, 各抒其志, 各表其意, 共同点皆在于他们的“文如其人”, 能与日月争光之人格情操和忠贞不渝的“华教精神”之体现。

这“华教精神”是什么呢? 前马六甲平民学校副校长陈锡祉《提起沈慕羽先生》一文, 追记一段1936年的往事: 时任“小老师”的沈慕羽在他的学生陈锡祉(按: 当时陈氏就读小学四年级)的纪念册上写了以下这段“傻瓜论”:

“傻瓜, 傻瓜, 我是傻瓜, 你也是傻瓜。可惜这世界的傻瓜太少了。我愿你我和一般志同道合的人, 永远做个傻瓜, 去感化世上无数自私自利的聪明人。锡祉同志勉之。沈慕羽敬题。三六年十一月二日”

(教总秘书处 1991: 105)

那是沈慕羽当年自喻为“傻瓜”的笔记，也是大马华文教育，文化传承的“精神”所在。华教典范，既有跟霸权势力搏斗的“怒奋空拳”，也有春风化雨，数十年磨一剑，“赢得两袖尽清风”的自在潇洒。就一直当个“华教傻瓜”吧！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参考文献

- 陈绿漪等，2015，《林连玉研究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学院；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等联合出版。
- 戴小华，〈文明互鉴与中华文化的世界理解：王蒙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副刊·读家》，2024年6月22日。
- 邓雅荣主编，2007，《恩雨润岳：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吉隆坡：文桥传播中心有限公司。
- 高嘉谦，2022，〈华教、华校与旧诗文脉〉，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编，《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页209-212。
- 何启良编著，2011，《历史慕羽：沈慕羽研究论文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
- 何启良编，2013，《沈慕羽日记全集（第一卷）》，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
- 何启良，2019，《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
- 何启良，2023，《沈慕羽日记研究：交游篇结客行》，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
- 黄润岳，1988，《古稀探秘》，马六甲：马六甲罗印务（马）有限公司。
- 教总33年编辑室编，1987，《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 教总秘书处，1991，《晚节飘香：沈慕羽先生七十荣寿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 李亚邀主编，2006，《晚节飘香续编》，加影：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 廖文辉执行编辑，1995，《沈慕羽翰墨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 林连玉，1986a，《连玉诗存》，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
- 林连玉，1986b，《吴钩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
- 林连玉，1986c，《杂锦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
- 陆庭谕主编，1997，《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 陆庭谕主编，1998a，《沈慕羽言论集（上）》，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 陆庭谕主编，1998b，《沈慕羽言论集（下）》，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 陆庭谕主编，2002，《沈慕羽翰墨集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 陆庭谕主编，2006，《沈慕羽翰墨集三》，加影：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 王蒙，2011〈文学把人与上苍相连〉，凤凰书品编，《文学还活着》，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页5-22。
- 王润华、潘国驹主编，2017年出版，2019年二版，《鲁迅在东南亚》，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
- 姚麟四主编，1982，《中学语文教师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碧芳，1992，《我的问题—专访集》，八打灵再也：文运企业、冲击社。
- 张锦忠，2022，〈“有一个人”：在南洋的铁屋以鲁迅为旗帜〉，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编，《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页206-208。
- 郑良树，2005，《林连玉评传》，吉隆坡：林连玉基金。